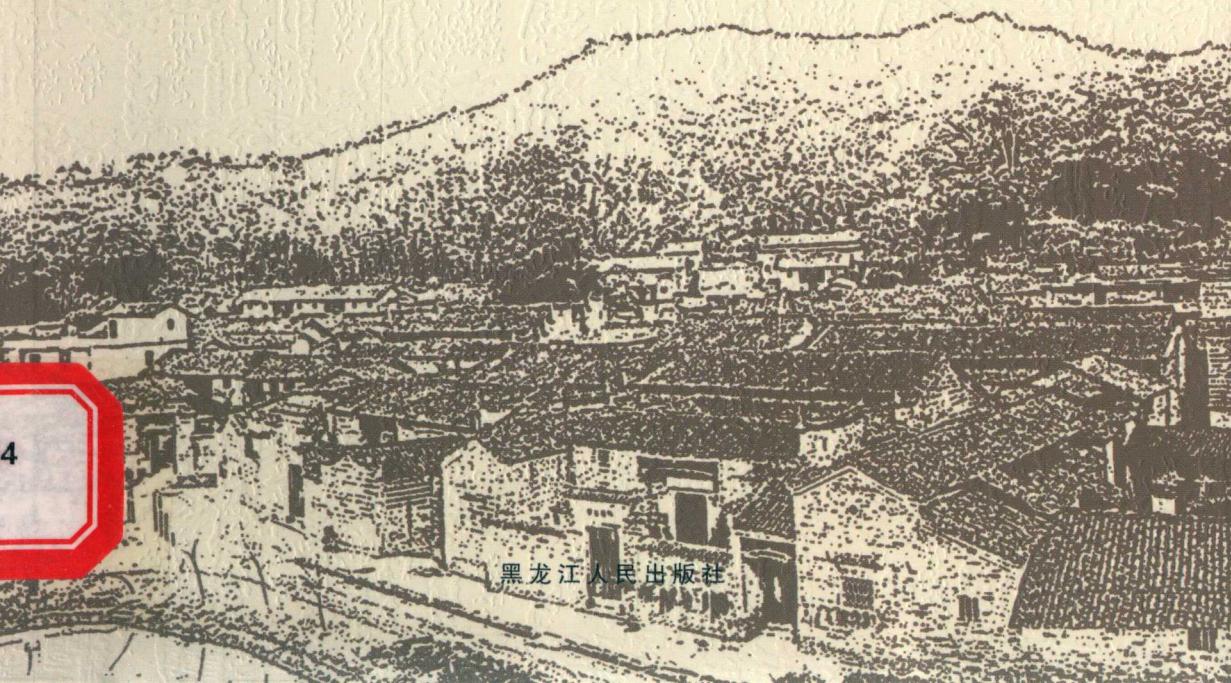


空石

客家古村：

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

主 编 ◎ 魏 炜 林晓平
执行主编 ◎ 郑庆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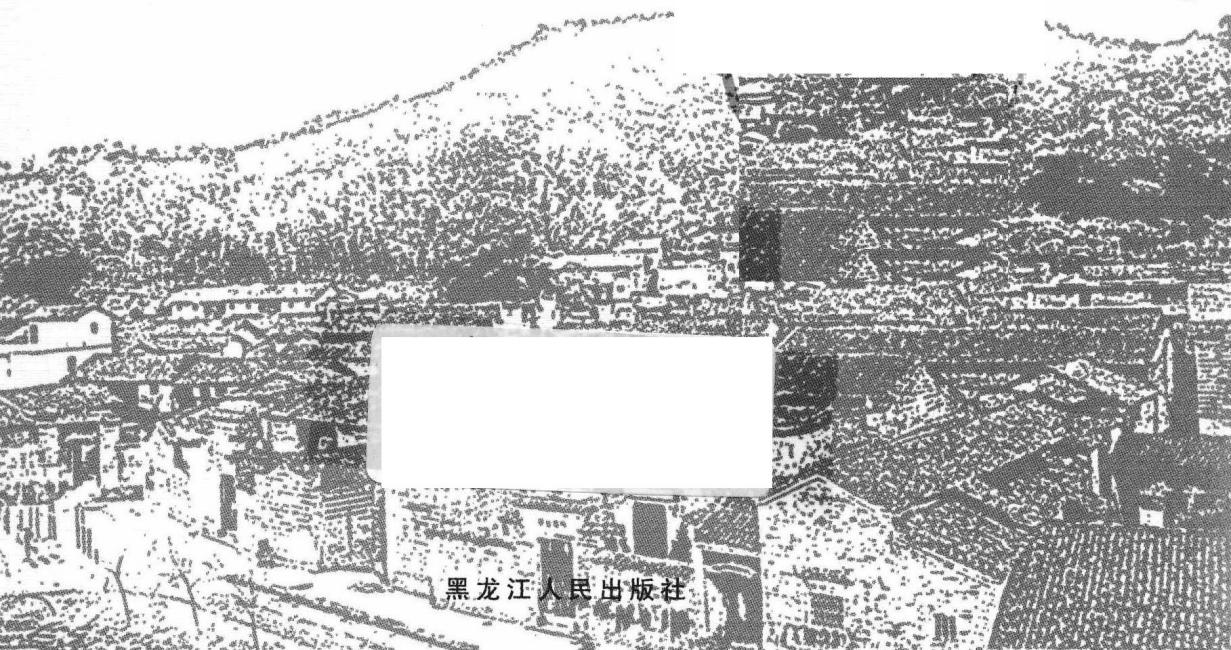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客家

客家古村：

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

主 编 ◎ 魏 炜 林晓平
执行主编 ◎ 郑庆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古村：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 / 魏炜，林晓平，
郑庆杰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 - 7 - 207 - 10468 - 7

I. ①客… II. ①魏… ②林… ③郑… III. ①客家人
—乡村—研究—赣州市 IV. ①K92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4829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装帧设计：鲲 鹏

封面题字：孙 峰

客家古村：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

Kejia Guocun: Lishi Jiyi Yu Shehui Zhanxing

主 编 魏 炜 林晓平

执行主编 郑庆杰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468 - 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本书由江西省高校“十二五”示范性硕士点（社会学）经费资助

《客家古村：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

编 委 会

主任：曾志刚

副主任：谢本亮 林晓平

成员：李坊贞 谢 康 钟俊昆 邓 伟

李晓方 魏 炜 孙 胤 樊国敬

郑庆杰 穆昭阳 黄清喜 曾耀荣

谢敏华 龚子方 温春香 王天鹏

序 一

谈起古村，可能就会想到漫长岁月所刻下的痕迹，比如古屋、古碑、古树、古井、古牌坊，以及一些色彩斑驳的古墙等，可能会认为古村必然是与现代社会或现代城市所不同的时空，没有空调、电视、洗衣机等现代化的事物，莫名地就将这个村落推到千年甚至是万年之前，而《客家古村：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则用充分的田野调查告诉我们，所谓的古村并不是田园，也不是异时空的他者，它同样是现代进程的一部分，同样也面临着很多现实境遇问题。

《客家古村：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是在对客家古村——白鹭村的实地调查中结集而成的册子。赣南是全国三大客家人聚居地之一，而赣南的白鹭村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客家文化底蕴的、有着百年历史的古村，正是在这样浓郁客家文化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看到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为我们呈现的镌刻在客家古村之中的历史记忆，以及在历史变迁中所展现的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民俗旅游、集体记忆、科举史以及留守妇女、新生代民工等都成为同学们所关注的对象。从内容上看，本书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民俗学，更兼具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的加入和融合，让本书呈现出一种较为丰富和完整的学术图式。

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是本书的两大主题，又是相互关联的主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是历史远远不仅仅是一面镜子，反而更多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而这种融入是一种传递，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延伸，对于历史的记忆、传递等都不断影响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比如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会有“反哺”现象，一部分是因为“乡村内拉的建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建构主要是集体记忆的积累和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正是这种历史精神和记忆的传递，才使得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造福于家乡，推动家乡的发展。历史记忆对于社会转型或是社会转型对于历史记忆来说并不意味着都是积极而向上的，社会剧烈的变化又可能会导致历史记忆传递的障碍，比如农村里很多青年男女都外出打工，这种年轻人口的缺失，可能就会造成集体记忆无人承载的情况。虽然书中对于古村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之联系没有太多



的阐述，但仍旧可以窥见他们对于当地历史与现状的展现和反思所做出的努力。

除了历史记忆和社会转型，本书还贯穿一条学术主线，就是古村落的保护。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开展，古村落保护同样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这种保护主要主张保护建筑的完整，甚至要求村民搬离古建筑以避免建筑的破坏。当然，对于原貌的外在的保持对于古建筑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这并不是古村落保护需要的最佳途径。地域文化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其地方性，对于白鹭古村而言，地方性在于“古”以及“客家身份”，这两者是白鹭古村最为突出也是最为独特的标识，而融合了两者特征的东河戏以及有关白鹭名人钟谷的传说和故事都是古村的显著符号。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具有双重特质，既是一种具体可见的物质客体，比如纪念碑、雕像等，也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是一种“具有精神内涵的、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从这一定义和阐释出发，我们可以将古村落的保护定义为对于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的延续。这种集体记忆是深入当地人骨髓的东西，这不仅仅是一种群体的认同，更是精神上的归属与反哺。白鹭古村中出现的农民工的“反哺”现象，正是对于白鹭精神的最好诠释。然而，对于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的延续并非是一个固守的过程，反而应该是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来包容一切新生事物，比如对于传统资源的开发、民俗旅游的发展，以及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当地妇女的地位的改变等，这些内容和现象都被融合进了白鹭古村的文化中，从而构成了古村集体记忆的现代性表征。

对于白鹭古村本身的记录就是对于它的保护。在探讨传统文化传承之时，往往涉及传承人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于无人可传，因为当地的年轻人大多都外出打工，这就使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技艺的传承陷入了危机。正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对古村的记录也增加了当地传统习俗能够延续的可能，巫觋、东河戏、宗祠、庙宇、族谱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的分析都是体现了外来者对于当地的认识，这种认识或深或浅，但在不知不觉中对当地的文化进行了记忆，或者说是对于古村落的“另类”保护。不管是对白鹭古村的传统信仰、传统戏曲以及各种传说、故事的深描，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农民工问题、留守妇女问题、民俗旅游问题、文化资产的估算或是土地流转问题等的思索，都包含着同学们对于白鹭古村最为直接的感受和认知，成为外界对于白鹭古村理解和认识的不可多得的文本。这些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样，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视角相互交叉，质性研究和量

化研究相结合，白鹭古村的学术面貌得到比较全面的呈现。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习作，还存在诸多问题。最遗憾的是这个村落没有“人”，有的只是一个“架子”。白鹭古村不属于研究者，也不属于游览者，真正属于的是当地的百姓，但是在文章中却很少论及他们的想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致使研究者对于古村“保护”的意义的落脚点不在于当地人，反而落在了外界，全然没有顾及当地人想要什么。脱离了当地人，何谈历史记忆和社会转型？所谓的保护，并非指的是一成不变地固化当地的建筑及已形成的各种利益层级，反而是一种平衡和协调多方利益的过程。在众多利益纷争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当地百姓的权益，只有真正地从百姓的立场出发，才能实现保护白鹭古村美好愿望，才能保证传统文化的延续。

本书是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对白鹭古村调查成果的汇总，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和努力，对于古村的研究起到相应的借鉴作用，同时也为我们更多地了解白鹭村、认识客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信息和思路。

万建中

2015年9月1日于赣南师范学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江西省政府“井冈学者”特聘教授)

序



序 二

让学生在田野中成长

两年前，赣南师范学院郑庆杰，作为我曾经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在赣南一个古村落建设了一个田野调查基地，有固定的教室，还可以提供住宿，不但可以经常带学生去调研，而且还可以在这里上课，开小型研讨会，希望我有机会去看一下。我听了好羡慕，也好神往，中间好几次要动身去拜访了，都因为各种事情给耽搁了。2015年6月25日，终于与耿敬老师到了这个久违的田野调查基地——藏在深山中的赣南白鹭。

这次白鹭之行，让我感触很深，不但这个基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我震撼，而且赣南师范学院社会学团队在当地长期耕耘为基地建设打下的良好基础更让我感动。他们这个基地建设已经有三年了，研究成果已经准备正式结集出版了，嘱咐我给他们写一个序言，我就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社会学田野调查基地建设的一些看法吧。

一、社会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需要有田野调查工作

社会学的学生，最大的优势应该是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了解这个社会，但是怎样才能做到更了解这个社会呢？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讲，要想了解这个社会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多读书、读好书，借助别人已有的认识来丰富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另外一个就是多参加社会实践，依靠直接的亲身体验来加深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除了这两个路径之外，至少还应该有两个更专业化的路径，一个是对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另一个就是专业化的田野调查。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人民大学的CGSS、CEPS，北京大学的CFPS、CHARLS，中山大学的CLDS等一系列大型调查数据库被建立起来，上海大学以都市研究为特色的SUNS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安交大等一系列方法培训班也为社会学数据处理培训了大量人才，在

此基础上，整个社会学学科通过大规模调查数据的收集、整理、处理和分析来认识这个社会的能力大大提升，相关人才的培养也逐渐走上了轨道。但是与之相对，愿意长时间泡在田野中，通过大规模的、系统的、专业化的田野调查来了解这个社会，同时给学生系统的专业训练的团队却相对来讲越来越少了。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不但需要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来记录，而且更需要通过精细化的田野调查来随时把握这个时代变迁的脉搏，发现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甚至很可能被随时扼杀掉的社会创新的火花。我们社会学专业培养的学生，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将来从事实务工作，拥有这个发现和调查能力都是必需的。上海大学在优秀论文培育计划中，要求每个纳入培养计划的学生都必须要有长期田野调查工作的经历，包括从事理论研究和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学生，硕士也要从事不少于一个月，博士不少于三个月的田野调查，目的就在于让这些学生在从事理论学习和大规模数据分析的过程中，也要时刻关注这个社会现实的变革，对这个变革的细微之处要有最直观的感受。

当然，从事田野调查与参加社会实践不同，参加社会实践是一种模拟体验，而从事田野调查则是利用专业化的视角和手段来研究这个社会，来体验非研究者本人所熟悉和亲身体验的社会事实。一个经历丰富的老人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和反思对这个社会有很深刻的认识，但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更需要的是，如何超越于自身的社会经验来获得对这个社会认知的能力。

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对于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术共同体意识也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对于社会学人来讲，就是要一起下过田野的。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同吃、同住、同调查”，对于社会学知识的代际传承至关重要，并且在同学们之间还可以培养出深厚的“革命友谊”。

二、社会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更需要固定的田野调查基地

目前很多学校的社会学专业，在介绍自己学科的时候，往往都会讲本学科已经建立了多少田野调查基地，但是实际上，大部分这些调查基地都是老师们个人曾经做过田野调查研究的地方，很少是组织行为，真正由某个院系专门和当地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合作建立，并且定期会派人去当地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可能并不多。能够有固定的场地，不但可以调研，而且还可以在当

地现场授课，结合基地场景召开学术研讨会，甚至还可以开放给国内同行来参观、学习，并从事调查研究，那就更少见了。而赣南师范学院社会学专业建设这个白鹭社会田野调查实践基地，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努力。

对于一些老师个人建立的田野调查基地，从老师个人的研究来讲，进入田野和熟悉田野的过程往往要花费这个老师很长的时间，并且即使这个老师在这个田野调查点经过了长时间的调研，由于其个人研究兴趣所限，他对当地社会的了解往往也是非常有限的。并且从一个田野调查点的维护来讲，一个老师的时间和精力毕竟很有限，当一个研究项目结束之后，原来的调查点能够保证每年去一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样随着继续调研和进入田野调查点的频率越来越低，地方政府官员轮换的频率又非常高，一个好的田野调查点能够长期维持往往是很困难的。

其实，一个好的社会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确实需要建立一些固定的田野调查基地。在过去几年中，社会学专业培养机构增加了不少，各个机构招收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但是在每年的毕业生中，真正比较长期地做过社会学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往往并不多，尤其是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做过长期田野调查的往往就更少了。除了一部分研究生可以比较幸运地每年跟随自己的导师做一些田野调查之外，绝大部分研究生为了完成论文，往往只能自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回到自己的老家，或者找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凭着感觉去做一些田野调查。至于本科生，除了有一些短暂的暑期社会实践之外，能够有机会作为访员，做过专业的问卷调查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学四年，真正有专业田野调查经验的往往少之又少。虽然教育部教指委讨论规定的社会学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了参与社会调查的环节，但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能够每届学生都安排由老师带队，让本科生进行一周以上田野调查实践的社会学本科院校，估计全国也超过不了5家。

建立起固定的田野调查点，至少可以有几个方面的好处。首先可以减少大量的“进入”成本。一旦与田野调查点建立起比较长期的关系，一个单位的老师和同学经常去一个田野点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人建立了比较熟悉的关系，后来老师和同学们再进入就比较容易了，可以省去大量“进入”的成本。其次，可以在知识上形成积累，有利于对田野调查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固定的田野调查点，研究者就可以反复进入，并且可以有不同视角的研究者进入，如果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形成比较好的资料共享机制，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田野调查点形成很好的知识积累，不同的研究者也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深入下去了。第三，通过与调查对象的反复互动，通过在

同一地点对同一问题的反复调研，可以逐渐摸索出一套比较典型的进行田野调查技能训练的方式方法，有效地提高同学们进行专业田野调查的能力。

目前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政策实践和人才培养在逐渐走向专业化的同时，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在政策实践领域存在着基层社会经验的“碎片化”和宏观政策“落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理念化”倾向比较明显，人才培养“不接地气”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通过建设固定的田野调查基地，构建以基地为组织载体的新型科研、教学与人才培养协同模式，可以把田野调查基地建设成为社会创新实践的系统“监测点”，新型社会治理方案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试验场”和实务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训基地”，这对于目前加强社会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社会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需要建设更多的田野调查基地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差异十分巨大，通过一两个田野调查基地来达到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目的还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调查的点多了，由于受到时间、进入条件等各个方面的限制，每个调查点往往很难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同的社会学机构在全国不同地方建立起多个固定的田野调查基地，不但不同的调查基地之间的资料可以共享，而且通过基地之间的协作，大家可以相互之间比较容易地进入到对方的基地进行调查研究，那么通过多点的比较研究来达到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目的就可以比较容易实现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内有多个研究团队试图相互之间形成田野调查基地的共享机制，包括以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为平台，这个事情就讨论了好多次，但是相对来说一直不是很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大家建立的调查基地，大部分还是研究者个人的田野调查基地，人格特色十分鲜明，一旦离开了当事者本人，其他人进入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基地之间的共享也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只有有更多的社会学机构在国内不同地方建立起更多的类似于白鹭这样的机构化的田野调查基地，那么基地之间的共享，包括实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多点比较就比较容易了。

应该说，在建立组织化的田野调查基地这个方面，赣南师范学院社会学专业建设的白鹭基地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他们建设基地的经验非常值得学习。本期的这批稿子，已经是白鹭基地第二批研究成果了，参与田野调查和文稿撰写的作者有社会学的学生，也有民俗学、历史学的学生，大家从不同

的视角来共同研究和解读一个具有非常深厚内涵的古村案例，读起来很有味道。

本书执行主编郑庆杰博士把这些鲜活的文字发到我信箱中已经快两个月了，距离限定我交稿的最后日期也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由于是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受命写序，心中很是忐忑。郑庆杰博士与我同龄，名为师生，实为挚友，中间他催了好多次，我依仗着“老师”这个身份，拖到现在，想说的话很多，暂且写出上述想法，跟学界同仁交流沟通，不当之处，请诸位学界朋友批评指正，也祝愿赣南师范学院社会学专业白鹭社会田野调查实践基地越办越好！能够为中国社会学田野调查实践和研究生实践调查能力培养，做出示范性贡献。

刘玉照

2015年10月4日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博导)

序

二

前　　言

自社会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专业从西方引介到中国以来，百年有余，基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调查，在一代代社会学学者的努力下，结出了累累硕果。众所周知的《江村调查》《乡土中国》《乡村建设理论》《祖荫下》《金翼》《一个中国村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家庭、爱情与亲密关系：1949—1999》等一系列为中国社会学界所熟知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专著，为一代代学者和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经典的调查案例。这不仅成就了诸多的田野调查点，比如江苏江村（开弦弓村）、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等，而且这些著作将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之中，讨论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整个国运沉浮、民族命脉、文化转型、社会变迁、群体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风雨历程。在扎实的调查、翔实的资料等基础上，这些社会学经典调查提供了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分析和思考。

学术文脉，薪火相传。面对数代前贤的丰富思想遗产，我们如何为中国的社会学建设添砖加瓦，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今，在江苏江村、山东邹平、云南魁阁等社会学经典调查地，挂满了各式各样某某大学社会学实践调查基地的牌匾，但是却极少见到学生扎根田野做调查。问询得知多为当天来回、至多两三天的停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朝圣意味远胜于调查实践呢？我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系统梳理了调查实践基地和研究生培养问题的现状，发现实践调查基地充分发挥作用的多分布于自然科学领域，其应用导向所形成的充满“互惠”关系的“校企合作”“产学研”联盟等，但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调查基地对于学生的培养多呈现为无法扎根的“放养”式调查实践，这就会导致理论和调查实践“两张皮”的困境。

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目前拥有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三个二级学科，社会学一级学科是江西省高水平学科，民俗学是江西省重中之重学科。基于现有的学科平台和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我们认为田野调查实践对于社会学专业是关键中的关键。2011年，江

西省社会学“高水平学科”负责人林晓平教授申请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100 万元，作为建设田野调查实践基地的起点。

我们选择了江西赣州赣县白鹭乡白鹭村作为调查实践基地的建设地点。这个村位列国家住建部和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具有近千年的历史，整个村落古民居建筑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都基本完整，目前正处于旅游开发之中。经过三年的建设，截止到目前，这个与中国民俗学会联合共建的白鹭社会调查实践基地已经初具规模，是一个集食宿、教学、科研、会议、田野调查、专业培训、地方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调查实践基地，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解决“扎根田野”踏实调查的专业培养需要。过去的三年期间，我们在研究生专业培养和实践调查之余，还与白鹭村联合建成了江西省第一个村史馆，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和省级媒体对于调查点白鹭村进行了“美丽乡村”“留住乡愁”系列报道。中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郑杭生教授、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教授都对白鹭田野调查实践基地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白鹭田野调查实践基地建成三年以来，在赣南师范学院校领导的支持下，社会学团队基于调查基地，扎实地开展了研究生的培养和专业调查实践活动，本书就是近三年来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社会学、历史学等专业研究生基于白鹭调查实践基地进行调查研究的部分成果。调查成果的公开出版，不是研究的展示，而是学术的公开交流，无论出版后学界对于本书给予怎样的评价，我们都相信，本书是我们扎实对社会学研究生进行田野调查实践培养的第一步，路还是要走。无论我们怎样付出基地建设初期的汗水、舟车劳顿、关系协调的烦琐，面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性探索，我们认为都是值得的。回首过去三年，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田野调查实践基地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收获。

第一，稳定的田野调查基地建设。白鹭田野调查实践基地第一期租期十年，配置了大量现代化教学科研设备，聘用了专人进行管理和维护，基础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配备齐全。这从硬件上提供了能够让学者、学生住下来、沉下心、扎根田野、进行调查的基本保障，而避免了“放养”式的松散式各自自由开展调查实践模式的弊端。

第二，田野调查中的“师徒制”。传统的师徒制在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体制

看来已经过时了，但是社会学田野调查中的大量默会知识和教学研究的互动机制要求，手把手的师徒制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每次学生调查，都会由专业老师带领，扎根田野3~5天，去之前锁定研究意向，到了基地之后老师随时对研究议题的提炼和选择、调查方案、访谈提纲、访谈策略和技巧、话语分析、内容编码等方面进行互动式的指导和反馈，每天早上调查前碰头、中午调查中反馈、晚上调查报告总结和分析问题，并制定第二天的调查方案。一般每学期三次这样的调查，研究生能够快速掌握调查实践的方法和模式，效果显著。

第三，面对田野的问题导向。无论进入调查实践基地之前有着怎样的预设，对于研究意向一定要和调查基地的田野资料发生碰撞，形成问题意识。这样基于经验实证调查形成问题导向，一方面能够让学生对于现实有直接的感知和资料的获得，另一方面能够弥合理论和现实的隔阂，让理论与现实相互验证，同时实现专业知识服务地方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关怀旨归。

第四，多学科的交叉整合。白鹭田野调查实践基地直接建成和扎根于村落之中，面对白鹭村的整体生活世界，无论是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历史叙事、社会记忆、村落群体社会组织，还是农业发展、留守人员、贫困问题、旅游开发等，都构成了村落的有机整体，因此无论是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工作、音乐美术等专业，都能够在这个调查基地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议题和田野资料。同时，每次不同专业的师生共同在基地开展调查，能够相互形成思想激荡和专业碰撞，跨学科的专业交叉和整合，使师生受益匪浅。

第五，有益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田野调查基地，在尽可能地提供稳定的调查条件之后，能够基于基地所在村落的基本情况，减少文化、历史、社会成员等影响因素的变动性，并使教学和科研、学校和社会、专业研究议题和地方社会发展需求、基础资料积累和纵深研究拓展、专业科研和地方协调之间构成稳定的关系框架，这就为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在师生指导、议题设定、调查实施、基地管理、教学科研评估、知识生产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培养模式。我们的研究生基于白鹭调研撰写的论文能够在中国社会学年会获得优秀论文二等奖，证明这种培养模式的有效性。

以上的收获或许是微小的、探索性的、不成熟的，但是作为地方院校的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能够结合本地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资源，毕竟是在专业研究和培养的道路上，能够为中国社会学专业建设添一分力量的尝试，是值得的。

编者

2015年10月